

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所属人群探讨

2005-7-5 石硕 阅读407次

一、藏彝走廊石棺葬的分布与特点

“藏彝走廊”主要指今川、滇西部及藏东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在这一区域中，继新石器时代之后所出现的最重要、最普遍的考古遗存，是一种被学术界称作“石棺葬”的墓葬文化。所谓“石棺葬”，又被称作“石棺墓”、“石板葬”或“石板墓”，是一种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为主要葬制的考古文化遗存。

这些石棺葬墓地多集中分布于藏彝走廊区域各个河流台地上，墓地中石棺葬均呈密集排列，或数十座、数百乃至数千座不等。许多石棺葬墓地不仅规模极大，墓葬数量众多，且石棺葬地点在藏彝走廊区域的分布范围也极为广泛和普遍。因此，可以认为，石棺葬是继新石器时代以后整个藏彝走廊地区最主要的一种考古文化遗存。

迄今为止，在藏彝走廊区域经正式发掘的石棺墓地已有近40余处，约700座墓葬。此外，还调查核实了一大批墓地。根据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发掘情况及有关研究，目前可以初步确认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主要流行年代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末年。在东汉以后，石棺葬这种独特葬式在藏彝走廊地区大幅度减少或渐趋消失，所以，东汉以后的石棺葬已极为罕见。目前仅发现有极个别和零星的几座属于唐至元明时代的石棺葬，但这些石棺葬主要为火葬墓，即焚尸后葬骨，可视为仅保留了石棺葬式而已的火葬石棺墓，实际上只是东汉以前所流行的石棺葬一些零星的残余形式。（罗开玉将唐至元明分为一期可，但从整体看，东汉以后只见残余）所以，石棺葬的主要流行时代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时期，进入东汉以后，石棺葬开始呈现衰落之势。

第二，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以石棺为葬式，这一独特形式的古代墓葬虽然目前在我国的东北、内蒙古、陕西、新疆均有发现，但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明显不同于东北、西北及其它地区石棺葬的特点，而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二，分布于藏彝走廊各地的石棺葬无论是川西高原、滇西北或藏东地区，虽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并可据其差异划分为不同的地方类型，但与这种差异相比，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共性则更为突出。目前，在各地石棺葬随葬器物中，皆以陶器中大双耳罐、单耳罐、小平底罐，铜器中的曲柄剑、扁茎无格短剑、三叉格剑、小铜刀、圆形饰牌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也就是说，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共性要大于其差异性。因此，罗先生认为，从考古学的文化定义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可以说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第三，与东北、西北及其它地区的石棺葬相比，藏彝走廊是目前国内石棺葬墓地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这也足以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至东汉时期，石棺葬既是生活在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人群普遍采用的葬俗和埋葬方式，也是他们留下的主要考古文化遗存。

由于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石棺葬数量巨大、分布密集，几乎遍及了整个藏彝走廊区域，同时由于整个藏彝走廊区域的石棺葬不仅存在着明显的共性，而且年代跨度极大，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东汉，时间绵延达2000余年。因此，从很大意义上说，石棺葬既是我们认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东汉这

一时期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之历史文化面貌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揭开古代藏彝走廊人群系统及族属源流的一把钥匙。

二、藏彝走廊石棺葬人群的羌、氏之说

石棺葬既然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时代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所普遍采用的埋葬方式，并且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又有着突出的共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是什么样的古代族群或民族集团的遗留？他们是当地的土著人群还是外来迁入者？

很明显，从石棺葬的诸多特点和迹象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文化应属于一个较大的人群系统。这个人群系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到东汉初，他们都主要生息和活动于藏彝走廊这个区域，是该区域的主体人群，并且长期使用着石棺葬这一极具共性的埋葬方式。那么，藏彝走廊石棺葬这个人群系统究竟属于古代什么族属面貌的人群？他们是否就是过去普遍认为的所谓“古羌人”呢？

目前要将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人群与古羌人联系起来，在史实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难点：

首先，按照先秦文献史籍的记载，在当时被明确称为“羌”的人群主要是实行火葬。《荀子·大略篇》记：“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不焚也”。《吕氏春秋·义赏篇》云：“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墨子·节葬下》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列子》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登遐’，然后成孝子。”《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以上这些记载均出自先秦的文献，说明早在秦以前，羌人已普遍习行火葬之俗。羌人行火葬这一习俗也为以后的文献典籍所记载，如《旧唐书·党项羌传》记：党项“死则焚尸，名曰火葬”。羌人既然在先秦时期已普遍实行了火葬，而石棺葬就其性质而言乃属土葬，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将藏彝走廊地区从新石器晚期迄于东汉初的延续时间如此之长、且数量如此丰富的石棺葬同历史上的“羌”这一人群系统相联系。

其次，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确有“羌人”自西北南下进入藏彝走廊的岷江上游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记：“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据这段史料的记载，既然公元前4世纪由西北向南迁徙即“将其种人附落而南”的羌人已达到了今甘肃南部与川西北相接的武都、广汉及今四川西昌的越嶲一带，那么羌人显然已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而且可以肯定，南下到越嶲一带的羌人显然是经由岷江上游地区南迁过去的。这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可得到进一步印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记叙当时位于岷江上游一带的汶山郡时，称“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华阳国志·蜀志》亦云：“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均证明在汉代地处岷江上游的汶山郡境内确有羌人部落的存在。……明朝初年，茂州汶山县官员亦称当地有“羌民二十八寨，言语不通。”，很显然，今天仅存在于岷江上游地区并作为我国56个民族之一的“羌族”，正是历史上活动这一地区的羌人之子遗。需要指出，今天分布在岷江上游地区的被称作“羌族”的人群虽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上的“羌人”，因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他们中显然已不同程度地混杂或吸收了不少其他的民族成份，但他们与历史上迁入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存在直接渊源关系，或者说他们今天之所以被定名为“羌族”很大程度正是历史上由西北南下的“羌人”进入岷江上游地区的一个结果，则大体可以成立。事实上，今岷江上游地区被称作“羌族”的人群其先民是从西北迁徙而来这一点不仅为他们自己所认同，也在他们的史诗、传说和文化习俗中得到较充分的反映。所以，他们或者说他们的主体是历史上羌人的后裔大体没有问题。

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今天居住于岷江上游地区并被确定为“羌族”的人群却并不认同当地的石棺葬是他们祖先的遗留，相反，认为那是与他们祖先完全不同的一种异类人群所遗留。这一点极为重

要。据今岷江上游羌族中流传的古老叙事诗《羌戈大战》传说，在他们的祖先由西北迁来岷江上游一带之时，当地已经存在着一种从事农业生产的“戈人”。他们的祖先曾与戈人进行了大战，直至打败“戈人”后，才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按照羌族的传说，“戈人”较富有，并流行石棺葬。今岷江上游的羌族将当地的石棺葬称为“戈基戛钵”，意为“戈基坟”。解放前，岷江上游羌族在过羌历年（羌族以农历10月1日为岁首）举行祭祀时，其端公（羌族巫师，羌语称“释比”）做法事的内容中，即要演唱羌族祖先与“戈基人”作战情形，所以“羌戈大战”的传说在岷江上游的羌族人群中以这种形式得到普及和代代流传，是他们关于其祖先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记忆，这个历史记忆中不仅包含了其对祖先之光荣过去的夸耀，同时也是岷江上游羌族借以进行族群凝聚的一个重要符号。当年冯汉骥先生在当地调查石棺葬时即称：“羌人对于此类战争之故事，尚津津乐道。”所以，有关“戈基人”的记忆在岷江上游的羌族中是极为深刻的。这就提示了一个重要的史实线索——当地的石棺葬可能是由一个与今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之先民即历史上由西北南下到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完全不同类属的人群系统所遗留。

从某种程度上说，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人群中流传的“羌戈大战”传说，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人群的族属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更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正确思路。正因为如此，该传说很早就引起了前辈学者的高度重视。早在1946年华西大学的郑德坤先生即根据羌人的《羌戈大战》传说，认为石棺葬并非羌族先民的墓葬，而应是《羌戈大战》中被羌人视作异类的“戈人”的遗留，他指出：

“长头型的戈人，基本上是一个农业民族。他们沿河而居，在台地上开垦土地，饲养牲畜。他们可能很好战，但过着定居生活，因此人死后就埋葬在住所附近。石板墓的外表，有点象成都平原上周秦汉时汉族盛行的陶棺和石棺，但是它的构造完全是沿着不同路线的，它是独特的和无与伦比的。此外，石棺葬也不是羌族祖先坟墓，因为羌族有史以来就实行火葬。”

最早对岷江上游石棺墓进行发掘与研究的冯汉骥先生在论及石棺葬的族属问题时，同样对这一传说同样予高度重视，他在文章中写道：

“戈人的坟墓，羌人尚能指出，现在羌地凡有黄土地带，用石块所起之墓，即是此类。墓中所出铜器多与长城地带者相似，其中有一种特别的陶器，黑色大耳，饰以旋纹，有似西腊之amphora陶罐是也。余曾在汶川县之小岩子，亲自发掘一墓，其中出一铜股排、铜剑、铁剑、铜斧、铁斧、秦戈与各种小铜器、金项带、珠饰及文帝四铢半两钱300枚，其他各种佩饰，不类汉人，亦不类羌人。……羌人言此即戈人之墓也。

但有人或疑此得非羌人祖先之墓，而彼等自行忘之者乎？是不然，因为羌人历来均行时……皆戈人墓也。最早亦不能早过春秋战国之间。”

这里，郑德坤和冯汉骥均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不是羌人所遗留，而是由羌人迁来以前就生活在此的一种当地土著人群——戈人所遗留。这就是说，他们均主张石棺葬是当地较羌人更早的土著人群之遗留。

但问题在于，岷江上游之羌族传说中的“戈人”或“戈基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应是属于什么族属种类的人群？对此，童恩正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曾对“戈人”的族属给出过如下的解释：

“在茂汶羌族的传说中，也不认为石棺葬是他们祖先所留，而称之为‘戈基人’的墓。据说戈基人原为茂汶的土著，当羌族最初迁入这一地区时，即曾与之发生战争，并以白石和木棍战胜戈基人，定居于此，所以羌人至今崇祀白石。这种传说中的戈基人，有可能就是指在川西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氏族而言。”

那么，“戈基人”是否即是“氐人”？此说是否能够成立？

综合来看，将“戈基人”确定为“氐人”，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前面所引《吕氏春秋》记：“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而不焚也。”《荀子·大略篇》亦云：“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不焚也。”这说明氏人与羌人一样，同样实行火葬。所以将石棺葬说成“氏人”的遗留，与“羌人说”面临的问题一样，同样难以自圆其说。

第二，童恩正将“戈基人”确定为“氏人”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应与古代“冉駹”有关，而“冉駹”很可能属于“氏”。将“冉駹”定为“氏”的证据仍显单薄，且推测成分居多。事实上，在上世纪40年代马长寿也曾据此得出过同样的看法。但在20多年后，随着认识的加深，马先生对这一看法作了明确的修正，指出：“二十多年前，我到四川西北部嘉绒地区考察半年，回来写了《嘉戎民族社会史》一文，发表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关于冉駹文中曾作了一些推论，现在看来，有的部分如分冉駹为二部，以冉即《魏略》中的蚺氏，都错了。谓冉为蚺氏，除了冉与蚺同音外，实在没有其它根据，很难成立。”因此，马先生明确提出了冉駹“非氏非羌”的观点。

第三，前面提到整个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存在明显的共性特征，因此从考古上看，它们本身应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在汉文史籍中，除了明确记载汉代汶山郡一带有氏人活动外，我们均找不到任何有关氏人曾存在和活动于藏彝走廊其它地区的记载，更无关于氏人曾出现于滇西、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的记载。而且从今藏彝走廊范围内仅有其东部边缘四川平武一带的白马藏人自称是氏人之后来看，历史上的氏人显然并未大规模进入到藏彝走廊地区。因此，要将藏彝走廊地区分布范围广泛、数量众多且延续时间极长的石棺葬说成是氏人的遗留，显然缺乏依据。

所以，将“戈基人”确定为“氏人”观点仍难以成立。

三、从汉代史籍记载看藏彝走廊地区与石棺葬对应的人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前辈学者以敏锐学术直觉均意识到今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之民族志材料即“羌戈大战”及石棺葬为“戈基人”之遗留的传说，为认识和辨别当地石棺葬人群的族属面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依据这一线索，许多学者也均认同当地的石棺葬应是同历史上行火葬的“羌”、“氏”人群不同类属且被“氏”、“羌”人群视作“异类”的“戈基人”之遗留。

既然“戈基人”不是今岷江上游地区羌族的先民即不属于“羌人”，同时也不属于“氏人”，那么可以肯定，“戈基人”必定是较之历史上进入岷江上游的“羌人”和“氏人”更古老的一个土著人群，也就是说，早在“羌人”和“氏人”迁入岷江上游地区以前，这种人群就已经存在于当地了。

那么，既不属于“羌”也不属于“氏”且较“羌”和“氏”都更早的土著“戈基人”，究竟是一种什么系统或什么族属面貌的人群？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难解的历史悬案。

但这个历史悬案并非无解。事实上，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途径只有一个——既然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年代跨度甚大，其年代下限已延伸到西汉末或东汉初，而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汉文史籍比较明确地记载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活动情况的时间正好也始于汉代，此局面实际上为我们通过史籍记载与石棺葬考古遗存的相互印证来认识和探讨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人群系统和族属面貌提供了比较切实的可能性。（待续）

石硕，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